

哈佛大學館藏 毛澤東「遺言」抄件跋

● 梁加農

美國哈佛大學馮氏圖書館 (Fung Library)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特藏部藏有一份題為〈1976年元月13日毛主席對王、張、江、華國鋒、吳德、王海蓉等人的談話〉的手抄件 (下稱「哈佛抄件」)。談話內容全文如下^①：

人活七十古來稀，我活了80歲了，人老了總是想後事，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爭了那麼幾年，把他們趕到那麼一個小島上去了。抗戰幾年中，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甚少，只有幾個人在耳邊嘖嘖喳喳，無非是我沒早把那個海島收回吧了。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做完，這筆遺產將移交下一代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在動蕩中移交了，搞不好血雨腥風。你們看怎麼辦，後代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哈佛抄件是由一位匿名的中國大陸人士捐贈給馮氏圖書館特藏部的。該部還收藏有其他來自中國的捐贈文獻，如已故文化大革命史專家王年一的未刊手稿。不過，哈佛抄件與王年一手稿不是同一來源，字迹也完全不同。

一 哈佛抄件與現行版本

哈佛抄件的文字內容與現下公開文獻裏的毛澤東「遺言」大致相同。這個「遺言」最早見於1988年王年一所著《大動亂的年代》，談話對象寫為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並註明談話的具體時間不詳，一說1976年1月13日，一說1976年6月15日，但王著沒有提供史料來源^②。1989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 (1949-1989)》也刊出了這個「遺言」，除文字少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後代怎麼辦」，以及談話日期只寫為1976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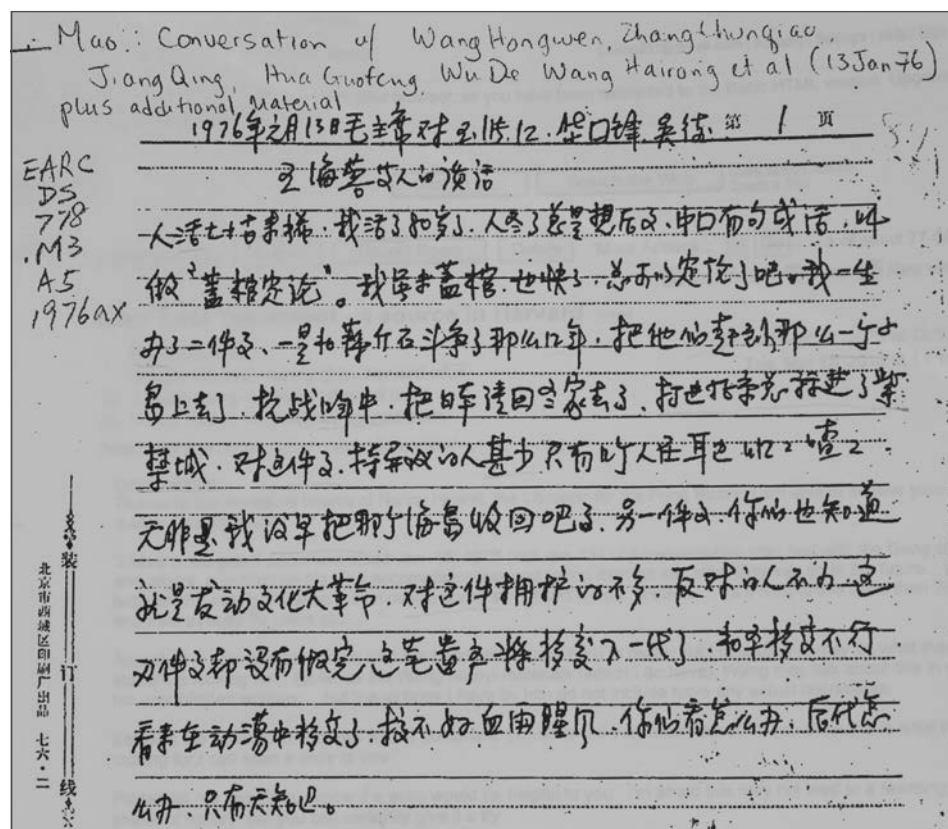
15日外，與《大動亂的年代》完全一樣，不過也沒有提供史料來源^③。後來，公私著述似乎均對這後一版本廣為徵引，史料的來源同樣未見披露，而王年一關於日期有二種可能的審慎註釋基本不再被提起。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這個現行版本全文如下^④：

人生70古來稀，我80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

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現行版本似乎經過了一些文字整理。如哈佛抄件的「人活七十古來稀」作通常的說法「人生七十古來稀」；「和蔣介石鬥爭了那麼幾年」作「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日本請回老家去了」作「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而有些句子在語義上也與哈佛抄件有所不同。如「無非是我沒早把那個海島收回吧了」作「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在動蕩中移交了」作「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你們看怎麼辦」作「你們怎麼辦」。

哈佛抄件的「我沒早把那個海島收回吧了」與毛澤東晚年在極小範圍裏講過的一段話意義一致，那就是1949年打過長江後「犯了一個歷史性



哈佛大學館藏毛澤東「遺言」抄件

的錯誤，就是沒有集中二野和三野的兵力解放台灣。那時蔣介石立足未穩，美國也不要台灣了，第七艦隊也撤走了。可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分兵了。二野轉戰西南了」^⑥。而現行版本「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則是一句大話。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三野（第三野戰軍）被迫取消攻台計劃後，毛很清楚兩岸分治已「無法更改」了^⑥。後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便曾對外界坦承「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力量」收回台灣^⑦。這句大話是毛的原意還是整理所致，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抄件裏毛澤東談話的日期與現行版本完全不同，而與最初王年一註釋的二種日期之一吻合。談話對象的排名先後也不同，而這又與日期有關。1976年1月，中央政治局的排名是如哈佛抄件所記的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吳德等，而到了6月，華已被毛破格擢拔上來。

2003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副主任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用了現行版本，談話對象簡寫為「華國鋒等」。不知何故，作者沒有依該書通例直接註引談話記錄檔案，而註為「參見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77年3月22日」^⑧。但葉的講話提到毛澤東的這番話時，只是大意，沒有全文。葉也不是談話的參加者。僅僅參見葉的講話，作者不可能寫出二百多字的毛的原話，似另有所本而沒有註出。

二 日期考訂

關於毛澤東這次談話的日期，《毛澤東傳》籠統地寫為1976「這一年」。但

從上下文可推為6月，因在「這一年」的上二行就提到「從這年五月起」^⑨。而該書網絡版則寫為「大概是這年六月十五日」^⑩。肖特（Philip Short）所著、國際著名的英文毛澤東傳記《毛的一生》（*Mao: A Life*）中節譯了王年一書中的毛「遺言」（Last Testament），時間也寫為1976「這一年的夏季，大概是六月」^⑪。

按照常例，毛澤東這次談話應是留有記錄的。當然，也有可能因內容敏感而後來被銷毀了。如1973年11至12月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的記錄，在毛去世，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被抓後就被銷毀了^⑫。再者，《毛澤東傳》編撰之時，除毛本人外，這次談話的當事人大都在世，作一番訪問，也不難把日期等搞清楚。該書有關毛生平中的一些重要活動的敘述，就是引用當事人紀登奎、吳階平、張玉鳳，甚至曾被判刑的吳法憲等人的口述史料。作者不此之圖，令人遺憾。

1976年6月15日這個現行版本的談話日期，不僅迄無直接的史料證據，而且與近年披露的諸多第一手史料矛盾。毛澤東的姪子毛遠新1975年10月來到毛身邊，擔任毛與政治局的聯絡員，直到1976年9月毛去世。毛遠新回憶說，毛「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也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⑬。

毛遠新的說法可與其他史料互為佐證。在1976年2月至5月毛澤東會見的最後幾批外賓眼裏，毛已是說話困難的病態老人，會見僅是通過翻譯「寒暄」幾句就結束了^⑭。1976年4月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後，毛與華不多的個人接觸也主要是以手寫作些簡單交流，如4月30日毛寫了「慢

慢來，不要招急」等三條。5月後，毛的健康急劇惡化，中央宣布毛不再會見外賓；6月向黨內省軍級以上幹部發出毛病危的緊急電報；7月，正式通知中央辦公廳起草訃告、準備後事。期間6月見到華時，毛寫了「國內問題要注意」七個字，是他留下的最後文字。而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華和他的同事王洪文等都不甚了了^⑤。如果說毛在6月還與華、王等談過一大段「遺言」，不是與上述基本史實矛盾嗎？

哈佛抄件和現行版本的談話對象中都有王海容，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此事不大可能發生在6月的判斷。王海容是毛澤東的表姪女，1970年後和年輕女翻譯唐聞生一起是毛會見外賓的主要工作人員，並進而成為深居簡出的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的非正式聯絡員，也因此捲入黨內鬥爭。

1975年11月，北京政局突變，毛澤東一改原先支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的態度，轉而發起批鄧。王

海容、唐聞生因曾一度 and 鄧走得很近而遭毛疏遠^⑥。毛先用毛遠新代替王、唐作聯絡員，並私下對毛遠新說，王、唐「那兩隻『小耗子』跳船了」^⑦。1976年4月25日，外交部長喬冠華夫婦向毛揭發王、唐曾為臨死的政治局常委康生帶話，「誣告」張春橋、江青歷史上是叛徒。毛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 (Robert Muldoon)、5月27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 時，翻譯都改由冀朝鑄擔任^⑧。

不過，1976年元旦，毛澤東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的女兒朱莉 (Julie N. Eisenhower) 夫婦時，王海容、唐聞生還是陪同翻譯人員。朱莉的回憶和中方記錄都顯示，當時毛雖現病態，但還有談話能力。毛在會面開場時用英語準確地讀出了朱莉轉交的她父親信件上的日期“December 23, 1975”^⑨，談話中還用了英語“Class Struggle”來表達他所強調的「階級鬥爭」^⑩。毛晚年的機要秘



1976年元旦毛澤東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夫婦，中間為王海容。

書張玉鳳也說，1976年1月中，她還與毛就周恩來的喪事有過對話。後來，毛說話更加困難，只好用筆寫出他的意思^②。因此，毛作有王海容在場的口述「遺言」的日期，1月13日比6月15日更為可信。

實際上，據曾任職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胡繩說，在毛去世前幾個月，這一「遺言」的內容就已傳出^②。1976年初，政治局委員紀登奎的兒子私下對家鄉河南來人說，「毛主席現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政治局裏出現「新派和老派之爭」，毛一死「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③，也隱約可見「遺言」背景。

三 「遺言」前後

在沒有新證據出現之前，本文認為，哈佛抄件比現行版本更接近原始記錄。現在把這個「遺言」放在1976年1月的歷史背景下加以釋讀，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似乎還有其他含義，不止自我評價生平而已。

1976年1月13日這一天還處在周恩來的七天治喪期間，毛澤東剛剛簽發了政治局報送的周的悼詞^④。可能正是周的死，觸動了毛的心事，引出了這一「遺言」。

自1935年遵義會議讓出軍權、扶毛上台後四十年，周恩來實際上是毛澤東「辦了兩件事」的第一幫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周一直擔任政府總理，1966年文革發動後又接替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黨內地位極其重要。當時不設國家主席，總理在外交上承擔着某些國家代表的職能，不可久缺。而因批鄧，中央人事又一次面臨重大變數。周的繼任人選關

乎來日無多的毛身後人事全局。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毛不會不想到這點。

實際上，毛澤東此前幾年間，也曾幾次說過他一生幹了兩件事^⑤。但這次「遺言」還談到了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和權力交接的憂慮，那就是對文革「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權力交接「搞不好血雨腥風」。而談話對象主要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即黨內「文革派」或政治局裏的「四人幫」，其中江青是毛的妻子。聯繫到毛此後不久給王、張的個別傳話「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⑥以及「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⑦，似乎不無言外之意寓於其中。

當時除毛澤東以外的五名政治局常委中，朱德年已九十，久不問事；葉劍英偏於軍事；在黨政一線的是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王是副主席，鄧、張是排名第一、二的副總理。鄧是資深老幹部，1956年就是常委，文革中曾一度被打倒，此時正因「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被批，已被排除出接班梯隊。依常理，周總理的繼任人選就輪到王、張了。這也符合維護文革成果這一毛晚年最大的政治遺產。

但王洪文、張春橋都是文革中由毛澤東一手提拔而驟居高位者，在領導層中「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從中央機關到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絕大多數都是文革中一度受過衝擊又復職的老幹部。毛判斷這些老幹部對文革「不滿意」，有的「要算賬」^⑧，憂慮王、張在他死後頂不住，「搞不好血雨腥風」。從他隨後起用文革中晉升政治局的中等資歷老幹部華國鋒為代總理看，這個「遺言」似乎還含有毛為這個出人意料的過渡安排打招呼的考慮。

四 後記

早有論者指出，毛澤東的「遺言」及之前一系列談話裏表述的對中國問題的最後思考，如「理論問題」、「階級鬥爭」、「教育革命」等，以及中美和解 (Sino-U.S. Rapprochement)，是毛晚年給中國和世界留下的最重要、也最具深遠意義的二項遺產^⑨。除了「遺言」，其他重要談話都已在毛生前公開發表。只有這份「遺言」，已近四十年了，原始記錄卻從未見披露，將來也未必會重現人間。筆者在這裏將哈佛大學館藏毛澤東「遺言」抄件的全文和照片公布，略加考訂，試作跋語，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關注，也期待知情者進一步披露有關史料，由此及彼，以期盡可能地去接近圍繞這一重要文獻的歷史真實。

註釋

① 〈1976年元月13日毛主席對王、張、江、華國鋒、吳德、王海蓉等人的談話〉，Fung Library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DS778. M3 A5 1976ax。抄件查尋承蒙哈佛大學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教授、圖書館員南希 (Nancy Hearst) 幫助，謹此致謝。

②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600-601。

③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409。史雲、李丹慧指出《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最早刊發毛的「遺言」(參見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660)，不確。該書在《大動亂的年代》之後出版，材料不出後者範圍。

④ 馬齊彬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頁409。

⑤⑥ 參見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162。

⑦ 陸鏗：〈胡耀邦訪問記〉，《百姓》，1985年總第97期，頁6。

⑧⑨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782；1781；1778；1782；1762；1766；1645；1766。

⑩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70271/4764608.html>。

⑪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9), 624-25.

⑫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458。

⑬㉗ 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頁40。

⑭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424。

⑮ 閻長貴：〈關於毛遠新的幾件事情〉，《黨史博覽》，2008年第8期，頁56。

⑯ Ji Chaozhu,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288.

⑰ Julie N. Eisenhower, *Special Peopl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7), 159.

⑱ 胡繩：《胡繩文集：1979-199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179。

⑳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頁73。

㉑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43。

㉒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87。

㉓ 錢理群：〈毛澤東新評〉，《明報月刊》，2011年8月號，頁21-24。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六西格瑪 (Six Sigma) 黑帶。